・新聞學研究・ 第一四六期 2021 年 1 月 頁 193-199 書 評

線上厭女的物質論與工具箱:《線上性別仇恨》

余貞誼*

書 名: Gender hate online: Understanding the new anti-feminism

作 者: Debbie Ging & Eugenia Siapera (Eds.)

出版日期:2019年

出版社: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母豬母豬夜裡哭哭」的性別挑釁,「臺女不意外」和「女權自助餐」的默會嘲諷,性私密影像外流時「跪求老司機」的載點卡位戰,這些景象都是線上厭女的表現型態。如果說,厭女是一種征服並剝削女性的方法論,那麼,對於這個方法論是如何運作的,可以約略劃分為個人論和結構論。前者訴諸個人心理屬性,認為個別厭女者在心中藏有對一般女性的敵意和仇視。Manne(2017)在 Down Girl 中便批判此取徑是種天真式的概念,無助於解釋厭女情結在本質上的社會功能。因而她將解釋取徑導向結構論,認為厭女實為一種系統性的,包含心理、結構與

投稿日期: 2020年7月13日;通過日期: 2020年8月31日。

本文引用格式:

余貞誼(2021)。〈線上厭女的物質論與工具箱:《線上性別仇恨》〉,《新聞學研究》,146:193-199。DOI:10.30386/MCR.202101.0005

^{*} 余貞誼為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email: jenyiyu@gmail.com。

制度表現形式的社會政治現象,因此我們需要理解其運作邏輯,並看見它的政治效用。

Debbie Ging 與 Eugenia Siapera 編輯的 Gender Hate Online: Understanding the New Anti-Feminism 文集,同樣也採用結構論的立場。然而更為殊異之處,在於她們將關注焦點,從文化詮釋的視角(如 Manne 所強調以父權意識形態為核心進行的概念工程),轉換到物質基礎的分析,去探究線上厭女現象是建基在何種技術能供性(affordance)之上,並以此來分析厭女行動的主體和樣貌。此種從文化面到物質面的方法論轉向,突顯的是面對線上厭女現象的焦慮,如其在導言中所說:

該如何面對這些朝向女性的新型態仇恨?只靠網路行動夠嗎?面對新的反女性主義,需要更新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嗎?這些都是難以由上而下來解決的問題。很顯然的,無論就所面對的危機與批評,現在皆處於關鍵時刻。……危機,它本身就是因無法對更好的未來提出承諾的結果。

……。這本書有幸在批判被固定下來之前,在事態仍舊流動和不確定的時刻,去記錄下這些危機。把焦點放在爭鬥發生的時刻,有助我們去捕捉其中的特定氛圍……,讓我們暫時停下來,評估並反省(頁11)。

Ging 與 Siapera 所說的關鍵時刻,指的是厭女和反女性主義浪潮乘著高度的媒體關注猛撲而來,並展現出新的歧視樣態。同時,複數的女性主義在面對這些洶湧的線上厭女和性別暴力現象時,也都各自踩出不同的解謎路徑。Gender Hate Online 很巧妙地迴避這些路徑之爭,認為在這厭女「結果尚未被確定」的時刻,記錄下更多發展中的狀況與態勢,會是打開新的思考與行動空間的契機。

依循著這樣的企圖,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物質主義的角

度來分析線上厭女的行動主體及行動基礎;第二部分則宛如行動劇,以 上述的厭女行動主體為本,上演各式線上厭女的劇碼和手段;第三部分 是以回嘴作為賦權,透過各種創意的反制行動演示女性主義者的回應與 抵抗策略,我將之視為是數位工具箱的提示。

科技資本主義下的厭女基礎

是誰在厭女?對比於九〇年代新男性運動是以集體現身的方式來發聲,本書主張,Web 2.0 之後,厭女/反女性主義的男性之存在樣態,比較像是一種鬆散網絡或集合。同時,其行動的訴求,也從藉由集體政治擾動來追求實質目標的方式,轉變成透過高度個人化的「受難」敘事和共通經驗,來形成情感性的公眾,宛若一種數位網絡社群(digitally networked communities),涉入政治議題的方式是透過說故事來引發個人性的、情感和同理的投注(如形成對憤怒的集體出口),而較少去呼喚一種政治行動。

那麼此種個人性的情感同理召喚,如何能沆瀣一氣地形成厭女浪潮?從物質主義出發,本書試圖從社會結構與技術條件的面向來梳理厭女行動的基礎。在社會結構面向上,本書認為厭女的基礎來自資本主義和性別意識促發的社會反烏托邦情節。一者,在全球資本主義下,社會的治理朝向新自由主義;在其移除了資本運作的規範限制後,創造出密集競爭、貧富差距擴大的環境。同時,由於生產模式也逐漸朝向新的技術和資訊資本主義,因而產生了宛如 Bell (1976) 所說的後工業社會,讓既存的手工業開始被認知和情緒勞動所取代。二者,女性主義和婦女運動的努力,使得性別間的教育差距逐漸縮減,女性開始大量進入勞動市場,與男性競爭同類工作。上述描述的場景,資本主義和女性勢力宛

如左右兩道壁面向內擠壓,使得(男性)行動者感受到日增的風險和不確定感。如此面向未來的壓力和焦慮,遂形成厭女和反女性主義的背景脈絡。換言之,若厭女是種社會政治現象,在本書的主張中,厭女就是新勞動分工鬥爭中的一環。

而在技術條件的面向上,本書主張,Web 2.0 以來,社會媒介的技術基礎結構(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s),形成一種讓厭女情緒/行動容易發酵的環境,包括匿名性所促成的發文不用負言責的迷思、即時連結的網絡讓搜尋、傳播與串連變得益發便利、超連結的環境易促成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用,以及在演算法政治下,社群網絡中容易形成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Colleoni, Rozza, & Arvidsson, 2014)等。如在第五章 Cockerill 便以 memes 為例,指出 memes 通常會把複雜的女性主義歷史和哲學基礎,簡化成是一系列令人不快的女性類型,然後形成一種自我維持的循環:一個暴力厭女的 memes 吸引了認同其訊息的人,當他們參與社群後又會創造出更暴力的內容以符合社群的品味;而當這樣的內容成為社群的特徵被標明與分享後,又會再次吸引志同道合的厭女者。

上述從物質基礎切入的分析,究其紋理,在社會結構面的解釋過於簡化,在技術基礎層面的分析也流有技術決定論的味道。但作為一種把厭女現象的分析從文化層面轉向物性(materiality)探究的提醒,這本書仍然有其貢獻。從 McLuhan(1964/2001)提出「媒介即訊息」以來,媒體研究開始意識到媒介不僅只是承載訊息的工具;反之,作為社會事實與閱聽眾之間的中介者,媒介的物質存在樣態本身即會影響意義的產製、傳播和互動方式。厭女行動以線上媒介作為表現空間,是一種含括個人情緒、群體互動與媒介氛圍的文化實踐,需要人、事、物、情境等元素的聚合才得以展現(Pfaffenberger, 1992)。因此,若能在分析

時包含物性的作用,能夠幫助我們看見線上厭女如何藉由社會結構與技術的介入和聚合,讓某種表現形式成為可能,並構築出一種新的社會氛圍、群體動態和文化特徵。

你的仇恨,我的回嘴:線上厭女工具箱

本書在第二、三部分的結構安排可以說是工具箱的兩面對應:一面是線上厭女的表現形式所動用的媒介與語言資料庫,另一面則是回嘴抵抗的線上工具與創意戰術。首先,在線上厭女的表現形式上,內容聚焦在線上厭女的手段及其隱含的性別文化。如果說,厭女是一種社會政治現象,行動者所流露的是對壓力之反撲和權力之爭奪,那其意念落實為實際行動時,本書所描繪的行動意象幾乎都指向暴力,尤其是性暴力、性羞辱和性威脅。在第六章的 Dunne、第八章的 Banner 與 Paron 都不約而同的以 Bill Cosby 的性侵案為題,從修辭的取徑討論大眾輿論所蘊含的強暴文化和強暴迷思。大眾所使用的修辭,一方面以單面向的觀點來定義「真正的強暴」(如要是陌生人、動用暴力且有身體創傷),藉此弱化強暴行為的嚴重性;另一方面,此種「真正的強暴」觀念也框限出一種「理想受害者」形象,非如其典型的受害者便會被冠以道德缺陷或復仇毒蠍的評判。

分析大眾輿論的意義何在?在臺灣的語境裡,大眾線上輿論經常會被以「那只是鍵盤戰士」、「說說而已」來辯護,或勸慰觀者勿小題大作。然而,如同 Bormann (1972, pp. 400-401) 所言,所謂修辭,其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實在。檢視修辭的建構,同時就是在檢視其中的社會關係、動機和效應,並且得以看見是誰參與建構了這樣的社會實在。因此,若我們能藉由分析修辭,去闡明是誰且如何參與了修辭觀點的建

構,而參與者是如何將自己安置於社會階層中,又是如何行動以達成鑲嵌在修辭劇碼中的目標,抑或是參與者如何被修辭中所呈現的戲劇內容所喚起等,將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運動及其追隨者的樣態。

我認為,本書第七章 Amundsen 談復仇式色情時,幾乎可說是延續了 Bormann 的觀點。她將復仇式色情定位為一種言說行動(illocutionary speech act),亦即這個行動的構成,不僅只是說出來的言語,還包括其言外行動;而言外行動是否能夠成立,端視說者的言論和表演是否能讓聽眾領略其意圖。以復仇式色情而言,說出來的言語是未經同意被散布的性私密影像,而言外行動則是在表演一種對女性的羞辱。由此推衍而來,線上厭女為什麼不能僅被視為是無傷大雅的「只是說說」,在於這個「說說」之所以能達成效果、讓人明白其言外之音,正意味著它鑲嵌在、也持續建構著一個共享的社會關係和文化框架(如對女性身體、性慾的社會規範與期待),才能讓說者和聽者擁有共享的意義庫以得到相同的默會(性私密影像的散布是具有羞辱意義的)。

當線上厭女挑釁無所不在,回嘴的可能在哪裡?本書第三部分的回應和抵抗可說是最生猛有力的示範。包括第九章 Kuo 研究以 GIFs 作為表達女性主義者憤怒的出口,開拓出一種互動的微空間(microspaces),既作為自我表達,也運作著種族和性別政治。第十章 Chakraborty 探究行動者以在社群媒介公開性騷擾加害者的名單,作為一種對強暴文化中對加害者/受害者關注不均的抗議。第十一章 Lokot 則討論 hashtag 和線上社群的運用如何在俄羅斯的網絡威權主義中撐出女性主義的發聲空間。其中遊走在倫理界線的 Beautiful People and What They Say to Me 創作(將收到的惡意威脅,與這些威脅者公開在網路上的照片整合起來,讓他們日常生活的美好模樣與所說出口的仇恨言論並置在一塊),以及第十二章 Brightwell 所討論的@feminist_tinder(將因為在 Tinder 個人介

紹中說自己是女性主義者而收到的大量恐嚇、貶低和辱罵,截圖張貼於公開的 Instagram 帳號),都在藉此創意回嘴的行動,激發觀者重新去思考,究竟是誰被包含、誰被排除於「常規生活」的參與和定義之中(當然,我們也應該更細緻討論其中是否對倫理和隱私造成侵害)。

這工具箱的兩相映照,其實正凸顯了物的能供性不僅建基在物質功能上,還包含它被鑲嵌進的文化情境及其行動者的樣態之中,藉由彼此的共構才建基了現象的穩固性。因此,我認為在閱讀上,可以多加留意本書如何呈現線上厭女現象的人、物和情境脈絡間的交互作用,並以此角度來思考線上厭女現象的生產與再生產、中介與延伸。在線上厭女結果未定的時刻,這樣的描繪與理解,無論在理論、方法與實踐的意義上,應都能是打開新的思考與行動空間的契機。

參考書目

- Bell, D. (1976). The coming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e Educational Forum*, 40(4), 574-579.
- Bormann, E. G. (1972). Fantasy and rhetorical vision: The rhetorical criticism of social re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8(4), 396-407.
- Colleoni, E., Rozza, A., & Arvidsson, A. (2014). Echo chamber or public sphere? Predicting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measuring political homophily in Twitter using big dat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2), 317-332.
- Manne, K. (2017).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Luhan, M. (1964/2001).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London, UK: Routledge.
- Pfaffenberger, B. (1992). Technological dramas.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7(3), 282-312.

・新聞學研究・ 第一四六期 2021年1月